

## 【论 文】

#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

——兼论王明柯、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王红艳<sup>1</sup>

民族识别政策以来，中华民族被表述为由汉族和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在此大家庭中，汉族和其他非汉少数民族并列，是并列族群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体，不同民族（或族群）是多元。然而，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更多是以汉族为表述而存在，一体即主要以“汉”为表达的一体，多元则主要是“汉”中所包含的多因素群体。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指向多元融合体，可将之视为华夏一体的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之后的“汉”指向单一族群，可将之视为族群之汉。那么，历史上华夏之汉是怎样形成，其边缘如何扩大，即不同群体如何融入汉，进而形成包含多元因素的汉，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近代以来汉的边界又是怎样收缩，原包含多因素的华夏之汉是怎样演变为单一族群的汉族，这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忽视“汉”概念的变化将会在中国族群研究中产生怎样的后果，同样也是引人思考的问题。

## 一、王明柯与张兆和对“汉”的理解

在探讨历史上汉族的形成、不同群体如何融入华夏文明的研究中，王明柯的一系列研究<sup>2</sup>具有重要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攀附》一文。尽管《论攀附》主要探讨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历史基础，但该文详尽论述了华夏汉多元一体的形成机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华夏汉族多元融合的形成历程。在《论攀附》中，王明柯认为近代以来黄帝或炎帝为共同祖源想象的中国国族建构是一沿续性历史过程的最新阶段。在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从一混沌初成的族体逐渐在政治地理边缘以及社会边缘扩张，华夏边缘的扩大也是历史上非汉群体不断融入汉并形成汉族的过程。王明柯论述中的华夏之汉不仅包括当代的汉族，还包括原为华夏政治边缘、被视为蛮夷的非汉群体以及中国境内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群体。他认为历史上处于华夏边缘的少数民族以及处于华夏社会边缘的底层群体通过得姓、祖源记忆攀附黄帝或炎帝以达到身份认同，将自身融入到华夏范围之内，从而不断扩大汉的范围。

通过王明柯的分析，可以看到，历史上作为华夏之汉的汉至少由三部分群体构成：一，华夏核心群体，即居于中国域内中心位置的中原统治上层；二，居于华夏政治边缘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群；三，居于中国域内华夏社会边缘的底层乡野群体。王明柯把第二与第三部分群体，即乡野之民与少数民族群统称为华夏边缘群体。他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的扩张机制源于边缘群体对中央华夏的攀附，也就是说边缘群体透过与皇帝或炎帝构建血缘联系或祖源记忆，同时对周边其他群体的贬低使自身融入到华夏群体的身份认同中，进而将自己融入华夏群体。而且，攀附历程至少从战国时起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这一历史过程王明柯称为边缘群体对华夏的攀附过程，费孝通称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sup>3</sup>。这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民族识别政策之前

<sup>1</sup>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sup>2</sup> 关于华夏边缘的研究，本文主要参考了王明柯的两本著作和一篇论文，分别为《羌在汉藏之间》、《华夏边缘》、《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

<sup>3</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汉族的形成，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这里的汉可视为华夏之汉。华夏之汉的形成如费孝通所指出：“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sup>1</sup> 因此，历史上的“汉”是一个包容多元群体、边界开放、多元的汉族。

而且，华夏之汉不仅是多元的表述，也是一体的表述。王明柯所论述华夏之汉形成的历史语境是历史上族群意识不太强烈，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前的历史语境，在此历史语境中，“汉”是中央文明的表述，融入到“汉”的集团中就等于融入到华夏文明或帝国范围之内。历史上被视为蛮夷的群体或被视为乡野的群体更多指向的是“文明”与否，而非群体身份上的区分。因此，边缘族群可以通过宣称自己与黄帝、炎帝或象征文明的祖源联系改变蛮夷或乡野的身份，从而晋升到华夏文明群体之列，也会出现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贬低对方为蛮子的现象。因此，融入“汉”或认同“汉”的身份更多是对帝国或中央的认同，是对华夏一体的认同。

不难看出，王明柯的研究中，“汉”具有与华夏重叠之处，即“汉”更多指向于多元的一体，这个一体中融合了当代的汉族以及民族识别之前的非汉群体，这里的“汉”与当前中华民族有更多相通之处。对“汉”的攀附融入到汉中进而达到对当时一体的认可，汉本身即是一体，是一体的表达，少数民族认同“汉”是对一体的认同。

因此，华夏之汉是多元的融合体，更是一体的表达，历史上不同族群对“汉”的认同更多指向于对华夏一体的认同。近代以来，尤其上世纪50年代后国内少数民族经历了民族识别过程，在此过程中，原先被视为汉边缘的蛮夷群体重新界定自身，非汉群体多以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与汉族并列的中华民族一体之内的族群。经过民族识别，“汉”的包容性收缩，由原先包含多元的一体逐渐转变为单一的族群，“汉”作为一体的表达逐渐被中华民族一体的表达所取代。“汉”向单一族群转变、其他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重新界定以及不同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形成三个相关过程，这是张兆和族群身份研究的历史语境，张兆和提出的挪用策略正是非汉族群标识自身族群身份的一个策略。

在《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sup>2</sup>中，张兆和论证了近代以来苗族如何通过挪用他者意象标志、维系自身身份认同。文中，作者分别从历史上苗族千年教起义传统、民国时期苗族土著精英要求国家承认苗族为中华国族国家体制内一个少数民族、1949年后土著知识分子书写官方苗族历史适应民族政策以及“革家”土著群体抗拒苗族身份寻求国家承认他们作为所自称的单一民族类别四方面论证了苗族土著群体标识自我身份认同的历程。非汉群体透过他者意象的转换、挪用和驯化来创造和维系自我的群体主体身份，挪用策略即是当地群体建构自身身份认同机制。张兆和认为在历史上，中央统治集团形成了丰富的以苗族为他者的概念想象，苗族群体正是通过挪用他者想象创建和维持作为族群主体的身份认同。他列举了历史上苗族通过挪用、转化华夏帝国对苗族妖魔化的身份起义，民国时期以及1949年后苗族土著精英挪用汉人对周边群体的他者意象和建构汉人作为他者概念来实现身份认同。

张兆和虽然没有说明历史上“汉”如何转变为当前的汉族，但当地土著族群通过挪用他者意象建构自身身份认同，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原“汉”边界收缩、汉由华夏一体向族群转变，“汉”由一体的表述向中华民族一体表述转变的过程。如他所述的民国时苗族精英梁聚五等要求国家承认苗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身份，梁聚五要求承认苗作为少数民族有一个前提，即他首先承认苗族族群本身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认同中华民族的框架之内进行身份认同。除千年教之外，苗族群体在抗拒汉族身份认同的同时，积极将自身融入到中华民族一体中，在认同中华民

<sup>1</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sup>2</sup> 张兆和，“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研究生论坛之《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走廊》2010（8）



族前提下标识自身身份认同。这与历史上非汉群体攀附“汉”有着相通之处。在历史上汉是一体的表达，而近代以来，一体由汉逐渐转变为中华民族，“它（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sup>1</sup>民族本身的层级性逐渐凸显。

因此，张兆和所论述的“汉”不仅指向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族群意识逐渐强化背景下在中华民族范围内与满、蒙、回、藏等相并列的汉族，而且更多指向在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后作为与识别之后其他少数民族群相并列、中华民族之内众多族群之一的汉族。

对当前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对当前自身族属的认同进而融入到中华民族一体中，这是当前非汉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共性，伴随此过程，原先的“汉”转化成一体中的单一族群。张兆和在西南苗族身份认同研究中，汉族从融合了多元因素的一体逐步走向包容性降低、边界清晰的族群之一。因此，张兆和在论述苗族作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揭示出了汉族边界收缩的过程。在张兆和的研究中，“汉”的边界在缩小，作为族群呈现。挪用策略正是汉边界收缩的机制之一。而且，在张兆和的研究中，民族的层级性逐渐凸显，即中华民族是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体，在这之下，是各个不同族群的并列，即强调一体中的多元，汉是多元之一。在这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更高级的族群概念在民族识别政策中被建构出来，在中华民族一体中，各族群的差异性被凸显，汉族边界收缩，汉族中多元因素被分离。

由王明柯的研究到张兆和的研究，“汉”作为一个概念经历了如下变化：

“汉”作为华夏一体 → “汉”作为单一的族群

“汉”的华夏一体 → 拥有众多族群的中华民族一体

因此，在近代尤其是民族识别政策之后，汉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成为高一层次的民族，是融合汉族与非汉少数民族群在内的多元因素的整体，华夏之汉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如费孝通所指出的“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sup>2</sup>。原先“汉”的边界逐渐收缩成为中华民族族群内的汉族。

王明柯主要研究历史上族群边界变迁问题，以战国前为起点一直到近代为时段，论证了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外围的群体如何同化到一体中，并形成对一体的认同，王明柯关注的是华夏汉边缘的扩大。与王明柯不同，张兆和主要研究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问题，即研究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以及民国到现在，汉外围群体如何从“汉”中分化出去，并形成对中华一体的认同，张兆和的研究显示了作为族群汉的边缘的收缩。<sup>3</sup>对两位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恰好显示了历史上华夏之汉与近代以来族群之汉的差异。也就是说，王明柯对历史上“汉”的形成的分析以及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策略的研究，显示由华夏之汉向族群之汉转变的历程，在此转变中，原有“汉”发生变化。因此，对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汉”概念包容性的变化，忽视民族识别前后“汉”的差异即用民族识别后的族群观念套用原有族群现实，容易遮蔽现实世界中族群认同背后固有含义，将许烺光《祖荫下》误读为“民族错失”便是其中一例。

## 二、民族“错失”：学界对许烺光的误读

在族群认同研究中，学界存在普遍趋向，用民族识别之后的族群身份认同套用现实社会不同群体身份认同，这难免会导致对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地域群体表述身份认同的误解。最著名的

<sup>1</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sup>2</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sup>3</sup> 张兆和关于西南苗族身份认同的一系列研究均涉及到近代以来汉边缘收缩的问题，本文主要参考《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便是众多学者用民族识别后白族身份认同评判许烺光对民国时西镇人的研究，并将许烺光没有指出西镇人为白族人误读为“民族错失”<sup>1</sup>。

许烺光在《祖荫下》这部著作中，把西镇视为典型汉族聚居区、把西镇人作为汉族人进行研究。作者以云南大理西镇为田野点，试图用该地的家族文化解释西镇人个体性格的塑造过程，以此来揭示中国文化共性。作者提出，由祖先庇护主导的“大家庭理想”，导致西镇穷家和富户子弟的“地位人格形貌”产生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可以解释西镇人的种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也可以解释整个中国文化，甚至可以解释中国朝代兴衰。然而，自民族识别政策之后，西镇人主体与大理民家人一道被识别为白族<sup>2</sup>，绝大多数关于西镇人的表述都将西镇视为一个有少量其他民族的白族村镇。因此，《祖荫下》“弄错了民族”便成为后人对此著作以及对许烺光的定论。人类学界如利奇、郝瑞(Stevan Harrell)、马克林(Colin Mackerras)都持此种观点，他们或认为许烺光的《祖荫下》抹杀了“民家”和“汉人”区别，或认为许烺光上了西镇人的“当”，错误地将他们当成汉人<sup>3</sup>。

之后，国内学者对《祖荫下》进行反思，国内学者没有直接认为许烺光研究中存在“民族错失”，而认为当前白族居民身份认同上具有双重性。如段伟菊认为“当地人认同上具有双重性，他们的认同存在着编撰家谱所呈现出的‘汉人族源认同’与强烈的‘白族认同’两个方面”<sup>4</sup>，她把这种认同视为当地人身份认同上的“双重认同”<sup>5</sup>。

庄孔韶也认为现实身份认同中，当地人确实存在族属与祖源的双重认同，他不仅认为西镇人具有双重认同，而且认为福建百崎郭姓宗族同样存在双重身份认同。福建百崎的郭姓宗族，其族源认同古代名人郭子仪，而在族属上却认同于回族。庄孔韶认为西镇人和百崎郭姓宗族存在双重认同是因为民族识别赋予他们的白族和回族族属得到他们的认同，在本质上反映了他们在现代国家政治里呈现的角色与身份。他认为“通过族源的认定，表现地方社会对国家政策的反向回应，这样的宗族内涵，体现了一方面认同汉文化的族源，一方面又处在背离主流的族群对话的地位上，”这是“理念先在是儒学礼制濡化的结果，是地方化对正统化的回应的不同方式的基础。”<sup>6</sup>庄孔韶从民族国家与地方社会二者对话角度来解释双重身份认同，提出民族识别政策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不认为许烺光“弄错了”民族。

梁永佳则认为民国时代的大理社会，“民家”和“汉人”的差别并不重要，也不属于民族差别，不是双重身份认同<sup>7</sup>。他从四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他认为作为现实，民国时代的西镇人，明确地将自己界定为汉人，《祖荫下》的论述符合这一实情，不存在民族错失。进而，他认为有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的意见，其实质在于误用民族识别之后的概念解释民族识别之前的社会，从而忽视了民族识别对民族意识的强化，成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某些分类，在民族识别之前和之后，可能存在相当不同的意义，用“民族”概念将民族识别前的社会现象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民族问题”或“族群认同”问题，容易遮蔽那些现象的固有含义。接着提出国家权力对于“民族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巨大作用，可以说，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概念时，不考虑当代民族—国家的在场是不合适的。最后，他总结为国家权力对于“民族”和“族群”的关键意义已经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对于当代民族—国家尚处于雏形的民国时期来说，使用“民族”或者“族群”

<sup>1</sup> 关于许烺光“民族错失”理解，本文得益于梁永佳的《〈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一文，本文中关于“民族错失”资料部分源自梁永佳的分析。

<sup>2</sup>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9（5）。

<sup>3</sup>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9（5）。

<sup>4</sup> 段伟菊：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sup>5</sup> 段伟菊：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sup>6</sup> 庄孔韶：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

<sup>7</sup>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9（5）。



去理解尚未被国家权力认可为少数民族的大理人群，是一种将现象抽离出社会语境的做法。梁永佳指出了民族识别政策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他已经表达但没有展开论述的是民族识别前后“汉”概念的差别所导致的白族群体自身身份认同的变化。民族识别之前，白族作为“汉”中的一个元素存在，所以当时西镇人自我界定中，没有白族认同意识，而把自身认同为“汉”。这种认同一方面有对“汉”的认同，更多表达的是对中华帝国或华夏一体的认同，这种对“汉”的认同在家谱或口传中保留并流传下去。具有强烈祖先崇拜意识的西镇人，经历了民族识别之后，白族族属意识开始强化，现代西镇人不可能轻易改变祖源记忆，但同时现实中白族身份的出现又使得他们逐渐认可现实中白族的族属身份，以此与当前汉族相区别。当然，他们在当前语境下，认同自身为白族人的同时也认同自身是中华民族中一个群体。这种看似认同上的矛盾正是“汉”概念的收缩且同时也是华夏一体的“汉”向中华民族一体演变使然，是当地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所经历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精确表达，真实反映了“汉”概念变迁的现实痕迹。

因此，西镇人的认同不全是双重认同，许烺光把西镇人作为汉人研究没有失当之处，不存在民族错失，存在错失的恰恰是后来研究者。后人关于民族错失的原因在于对民族识别前的“汉”与民族识别后的汉族的混淆，正是后来研究者忽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导致了对许烺光的误读。诚如梁永佳所指出，有关《祖荫下》的民族错失的意见，其实质在于误用民族识别之后的概念解释民族识别之前的社会，从而忽视了民族识别对民族意识的强化<sup>1</sup>。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对于像民国或更早之前的大理民家这些当时被认定为包含在“汉”群体内的人群，他们认同的汉不仅仅是汉族，更是多元一体的华夏之汉，当时的“汉”不仅指向汉族，同时也包括王明柯所研究的华夏边缘群体。西镇人“汉”的祖源正是对这种华夏一体祖源的记忆，而当代白族人认同的白族族属是民族识别后与汉族相对的白族。当前白族人认同上的祖源与族属的双重性是汉边界的收缩所致，是历史上华夏之汉与当前族群之汉区别所致。

因此，忽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是导致当前关于“民族错失”的争论，透过类似争论，能够看到“汉”概念的差异所带来的研究中的误解。

#### 参考文献：

- 王明柯，2008，《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
- 王明柯，2006，《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明柯，2002，“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73 本第3分，2002。
- 费孝通，1988，“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
- 张兆和，2010，“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研究生论坛之《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走廊》，2010（8）。
- 张兆和著，李菲译，2008，“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 郑君雷，2010，“汉代边缘地区汉文化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研究生论坛之《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走廊》，2010（8）。
- 梁永佳，2009，“《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52期。
- 许烺光，2001，《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 段伟菊，2004，“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 庄孔韶，2004，“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1）。

#### 【论 文】

<sup>1</sup>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9（5）。

